

## 冷戰時期泰國華文文學與香港因素\*

### — 以長篇小說為例

翁智琦\*\*

#### 【目 錄】

- |                |                  |
|----------------|------------------|
| 1. 前言：越界的先鋒部隊  | 4. 泰華長篇小說的香港想像   |
| 2. 冷戰文化與泰國華文文學 | 5. 結語：小文學與複系統的突圍 |
| 3. 泰華文學在香港的傳播  |                  |

#### 【摘要】

在1950-60年代，泰國的強力反共意識形態不僅排斥了泰國華人社群，對出版品實施的檢閱制度也影響了華文報社運營與文學作品出版。在這段時間，許多華文報社遭到關閉，更有華文作家被迫入獄。為了延續泰華文學的發展，泰華作家群在這段時間提出「泰華作品出國」的號召，並在香港出版多部作品。由於冷戰結構與港英政府的寬鬆治理政策，相較於台灣與中國，香港是當時華人出入境較為自由，同時也是高度商業化發展的地區。因此，香港不僅是中文出版基地，也是西方想像與消費文化的投射之地。本文檢視三部極具代表性的且在香港出版的泰華長篇小說，包含陳汀『三聘姑娘』、史青『波折』以及九位作者集體創作的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從中指出香港對於泰華文學的意義何在？泰華文學究竟如何在香港傳播？小說又是如何具體回應？本文認為，它們展現了冷戰時期泰華社群的豐富面貌，並且也表露出泰華文學如何有意識地在困境中突圍之策略。

【關鍵詞】文化冷戰；華語語系文學；泰華文學；泰華小說；文學傳播。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會議初稿形式發表於2016年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承蒙楊宗翰教授給予評論建議。此外，本文之英文摘要獲Animesh Rathore博士的閱讀與修訂協助，以及審稿委員給予諸多寶貴建議，讓本文有更多精進空間，在此一併致謝。

\*\* 釜山國立大學中語中文系客座教授 (antisweng@gmail.com)。

## 1. 前言：越界的先鋒部隊

自航海時代的地理大發現以來，帝國主義勢力擴張到亞洲，尤其東南亞國家。在這其中，泰國是位處東南亞唯一一個未被殖民過的國家。<sup>1)</sup> 即便如此，面對時局的變化，泰國從來無法置身事外。

作為東南亞一部份的泰國，也和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與群島、婆羅洲等地一樣，在20世紀後接收許多從中國、香港來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主要是來自中文語境（中國、香港）南來的作家<sup>2)</sup>、教師與報人。他們旅居 / 移居南洋，逐漸成為東南亞華文文學新舊傳統奠基者，並在當地建立起華文文學建制、生產模式與消費市場。<sup>3)</sup> 然而，當我們談論東南亞華文文學時，時常將東南亞華文文學視為一個整體，忽略東南亞各地因政治情境、語言與文化體質的差異，其實也造就出極具地域性、特殊性的在地華文文學。

張錦忠在討論東南亞華文文學時，就指出東南亞、華文與文學由於有著許多疑義與歧異性，使得東南亞華文文學一詞的定義無法產生清楚且確切的指涉。然而，正是這種無法產生清楚指涉所導致的「思考無能」，使得東南亞華文文學成為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張錦忠更在意的是當我們思考東南亞華文文學時所牽涉到的語言及其語境的思考。<sup>4)</sup> 本文在其啟發下，試圖檢視東南亞華文文學中的泰華文學，牽涉到何種歷史語言與情境，而其又展現何種屬於泰華社群的歧異性。

泰國華文文學（以下簡稱泰華文學）雖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一部份，然而泰國迥異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未遭受殖民之境遇以及泰國本身的政治、歷史與文化，基本上就提供了發展條件讓泰華文學成為一種開放概念。泰華文學在20世紀的發展基本上經歷了泰華評論者兼作家曾心所說的「三起二落」，具體而言，泰華文學的發展其實與冷戰情境、反共結構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關。（詳細情形將於下文討論）然而，當我們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框架中討論泰華文學時，時常落入中心 / 邊緣或者母體文化擴散論的觀點。

本文期望能從冷戰文化以及泰國的歷史特殊性來看冷戰時期泰國華文文學（以下簡稱

1) 必須要注意的是，即便泰國未被殖民過，然而泰國在19世紀末早已成為國際關係介入國內政治的戰場。當時，暹羅（Siam）搶先將權利與領土獻給西方強權，才倖免於殖民統治。參 Benjamin Zawacki 著，楊芬雯譯，『泰國：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戰場，在夾縫中求存的東南亞王國』，馬可孛羅，2019，p. 15。

2) 此處的南來作家指的是1930、40年代之後，從中國往南方地域移動的知識份子。有些僅短暫居住，有些則長期定居，他們大多帶有時代離散的身份認同。在泰國，以來自中國福建、廣東人口為最多，其中又以潮州為最大宗。

3) 關於中文與華文的意涵與用字之差異，本文參考黃錦樹，「華文 / 中文：「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文化，1998，pp. 53-92。

4) 張錦忠，「小文學，複系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意義」，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萬卷樓，2003，pp. 314-315。

泰華文學)的發展,嘗試建立泰華文學在冷戰時期與其他區域的傳播與連結。在本文初步檢視過程中,發現由於香港在冷戰期間的特殊地理位置與政治文化空間,使得無論在泰華文學的創作、生產、出版、傳播與影響等面向,都能看見香港扮演著重要的推手、中介或象徵角色,<sup>5)</sup>而這使得本文更加好奇,究竟香港與泰華文學的關係能如何詮釋?泰華文學是否有回應與香港的關係?如果有,又是如何回應?

泰華作家協會會長司馬攻在1990年提出「泰華文學要衝出湄南河,走向世界」的主張。<sup>6)</sup>司馬攻認為泰華文學作家須「立足泰國,面向世界」,然而他同時也憂慮泰華文學在迎向世界的道路上,易為了迎合其他地區的華文讀者,而捨去泰華文學的潮州語言特質。<sup>7)</sup>司馬攻一方面用「湄南河」象徵泰華文學的特質與主體,一方面又視之為有限的文學區域,必須突破這個疆界才能躍上世界華文文壇。<sup>8)</sup>司馬攻的文學主張基本上是受到世界華文文學論述的刺激而生。

1980年代初,中國學界提出世界華文文學,用以挑戰傳統中國文學研究獨尊中國大陸文學的普遍現象。當時司馬攻時常作為泰華文學代表參與世界華文文學的討論。在這股世界華文文學的熱潮中,司馬攻深刻體認到泰華文學居於其中的隱約地位,因而提出上述主張。然而,早在世界華文文學的論述與司馬攻的文學主張之前,泰華作家落葉谷已在1950年代提出「泰華作品出國」的號召,當時也獲得許多作家響應<sup>9)</sup>,在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出版近50多部文藝作品,其中以香港為最主要出版地。

有鑑於此,本文以冷戰時期泰華文學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作品陳汀(1925-1974)『三聘姑娘』、史青(1924-1996)『波折』以及由九位作者集體創作的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為例進行探討。一方面,長篇小說的形式屬於篇幅較長、內容較為豐富的文學類型,應能表達更為完整的文學世界觀;另一方面,長篇小說向來被泰華文學論者視為特色作品,而本文所討論的三部長篇小說則是分別在泰華文學史有著不同代表性的地位。『三聘姑娘』與『

5) 目前在泰華文學代表雜誌的網站『泰華文學』所提供的「泰華文學在香港出版」的統計資料可以發現,在司馬攻於1990年代提出「走出湄南河」的文學方案之前,泰華文學作品計有長篇小說29本,其中10本在香港出版;短篇小說25本,其中9本在香港出版;詩集共13本,其中1本在香港出版;散文共65本,其中11本在香港出版。總計而言,1945-1990年間,泰華文學創作共有132部作品出版,其中116部於曼谷出版,31部於香港出版,其餘則散佈在台灣、新加坡、中國等地。1990年後,泰華文學的外地出版則以中國為大宗。在50-60年代,香港更出版了一半比例的泰華文學。統計資料參考: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6&Itemid=84](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36&Itemid=84) [2018.01.30.]

6) 司馬攻以筆名劍曹撰述:「泰華文學要衝出湄南河,為最多,其中又已朝著走向世界,也不能迎合地方某些人的口味,更不可取巧。泰華文學必須在泰華的土地壯大,自強不息,大豐收之後才有條件衝出湄南河。」劍曹,『踏影集』,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p. 90。

7) 司馬攻,『泰華文學漫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 p. 49。

8) 陳大為,『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臺北萬卷樓,2004, p. 169。

9) 賴伯疆,「五四前後泰國華文教育、報刊、文化與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五四在東南亞』,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p. 174。

波折』是由作者個人完成，而『風雨耀華力』則是目前泰華文學史上唯二的接龍小說之一。<sup>10)</sup>陳汀的『三聘姑娘』因大受歡迎，也曾翻譯成泰文版出版，史青則是在冷戰時期最多作品在香港出版的泰華作家之一，而『風雨耀華力』的創作形式則是承襲自香港的接龍小說。<sup>11)</sup>也就是說，本文所探討的這三部長篇小說作品，皆屬於「衝出湄南河」的先鋒，它們都在香港出版單行本，如今已經成為泰華文學經典作品。本文認為，這些作品比1990年代的「衝出湄南河」隊伍提早實踐這個文學約定，它們用小說越界成為先鋒部隊。有鑑於此，本文著重討論冷戰時期的香港究竟具備何種條件與資源，以提供泰華文學出版的機會與空間。想像香港在泰華小說中又是具有何種意義？

## 2. 冷戰文化與泰國華文文學

要理解泰華文學社群為何提出在境外出版的行動，首先必須認識泰華文學的發展。

二戰爆發後，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肆擴張，華人社會掀起反日風潮，而華文報紙因抗日言論更聚集、鞏固了泰華社會各階層的共同體想像。然而，好景不常。泰國鑾披汶(Luang Phibun Songkhram)政權此時與日本靠攏，雖使泰國免於遭受東南亞其他大部分國家所受到的破壞<sup>12)</sup>，卻在境內實行排華政策，下令封閉正趨於活躍的全國華校、曼谷首都的華文日報，更宣布逮捕抗日嫌疑份子，如報人、商人、進步人士等。<sup>13)</sup>泰華文學在發展初期受到了一次受挫。

1945年8月15日日軍無條件投降，中國此時進入國共內戰，泰國政府從善如流地轉而與西方國家靠攏<sup>14)</sup>，加入美國、英國的自由主義陣營，並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而隨著冷戰的擴大，以及韓戰引起的效應，泰國對內部共產主義的威脅越來越在意。<sup>15)</sup>1954年泰國頒佈〈防止共黨活動條例〉<sup>16)</sup>。該條例頒發後，對當地親共之華人產生了有效的制衡效果。就在此時，泰國政局開始受到長達30年的右派軍事兼官方力量主導。

1957年由軍人沙立(Sarit Thanarat)策動的政變，開啟了泰國寫作者與知識分子的

10) 第一部泰華接龍小說為『破畢舍歪傳』，作者為亦非、亞子、沈牧、東方飄、亦舍、筆匠，1965年在曼谷環球書報社出版。

11) 司馬攻，『泰華文學漫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p. 114。

12) Williams, Leo E.,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5。

13) 巴爾，「泰華文學小史」，『香港文學』，第70-72期，1990年10月-12月，p. 4。

14) Williams, Leo E., *SouthEast Asi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35。

15) Smyth, David and Chitakasem, Manas, "Introduction", *The Sergeant's Garland and Other Stories*,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V。

16) 「泰國防止共黨活動條例」，『司法專刊』，第55期，1955. 10. 15, p. 2266。

「黑暗時代」(dark age)。在沙立政權的強勢反共主張下，將近兩百名作家與記者因共產黨人身分或共產黨同情者而遭到逮捕，憲法被擱置，議會被解散，政黨遭廢除，幾名政治人物未經審判即被處刑。這種高壓統治使政府取得預期的效果，作家被迫自願進行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或者放棄他們的使命感(calling)<sup>17)</sup>，左翼文化活動不時受到官方監控。國共內戰後，1950至60年代大批文化青年南渡，泰華文學因而有了新的發展契機。一方面華文報刊開始強調以文藝為訴求的副刊，因此，1950年代末是泰華文學創作較為集中的時期，這個時期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雜文、新詩等文類，而其中以短篇小說特別繁榮，是泰華文學的主要創作類型，<sup>18)</sup>而長篇小說則是重要特色。<sup>19)</sup>另一方面因為國共戰爭，又產生了新的一波移民潮。

此時期的南來文人由於思念原鄉，創作多屬異地異時的作品，即是所謂「新唐作家」文藝路線。而相對較早移居至泰國的華人作家則堅持寫作應反映「此時此地」的生活，曾因此與新唐作家起了爭論。後來雙方達成共識，認為「泰華文學應面向祖國並且和面向此時此地相結合」。<sup>20)</sup>雙方的討論其實涉及了「中華性」的問題，也就是周蕾所提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血盟」(bonding)情感造成的暴力」。周蕾認為，中華民族強調「血盟」的作法，是一種即使冒著被社會疏離的風險，漂泊離散的知識份子仍必須集體地抵制的暴力。<sup>21)</sup>

面對這樣的「暴力」，泰華的新舊社群最後選擇了「土親」。他們讓「血盟」得以融入泰國社會，避開被社會疏離的風險。我們或許也可以說，當時的華人作家其實已經在思考如何以「本土性」建構「泰華文學」的可能，或者說如何書寫具有「泰國特性」的華文文學之契機，而這也是張錦忠在討論東南亞華文文學時，所提出的「小文學，複系統」之論述。

張錦忠認為，「異」與「小」才能彰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意義。因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語境，雖各有不同，然而總歸而言，都能察覺「中文」與「華文」間的文體差異。「小」與「異」指涉了一個擴散力較強、言文傳統久大的中文複系統的存在。自覺的東南亞華文作家往往會努力將「東南亞」去畛域化，藉由語文煉金術尋找一套書面語文，以進入或面對「中文」。這其實是「去去畛域化」，或再畛域化的作法。<sup>22)</sup>也就是說，泰華文學作為一種小文學與複系統，除了具備中華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泰國性（或說泰華性、在地性）。也因此，

17) Smyth, David and Chitakasem, Manas, "Introduction", *The Sergeant's Garland and Other Stories*,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iv-xv. 以及賴伯疆，「群體意識和個人智慧的巧妙結合——淺談泰華文學中的「接龍小說」」，《廣東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pp. 188-189。

18) 司馬攻，《泰華文學漫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pp. 40-41。

19) 曾心，《給泰華文學把脈》，廈門大學，2005，pp. 4-5。

20) 巴爾，《泰華文學小史》，《香港文學》，第70-72期，1990年10月-12月，p. 2。

21)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p. 36。

22) 張錦忠，「小文學，複系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意義」，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萬卷樓，2003，p. 326。

曾心在討論現當代泰華文學特質時提到：

有人把泰華文學的不同時期劃為『僑民文學』、『華僑文學』、『華文文學』三條『分界線』。但不管哪條界線，泰華文學主要還是反映泰國華僑、華裔各層次的生活。……現在的泰華作品很少再去反映『葉落歸根』的問題了，而著重寫『落地生根』。這『根』已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而且似乎漸有逾越或突破華僑、華裔題材之勢。<sup>23)</sup>

然而，由於泰國政府對於華人在泰國的政治行動有所顧忌，在這樣的憂慮之下，泰國政府實行「同化」政策，強制施行泰文義務教育。同化政策使得大批華校被迫關閉，華文報刊的出版發行也受到限制。<sup>24)</sup>1958年8月20日，泰華報刊如『中原日報』、『光華報』及『體育週報』，因刊登新中國消息，被沙立政府下令封閉，泰華作家吳繼岳、方修暢、雲威川等，以共產黨嫌疑被捕入獄。<sup>25)</sup>在這期間，僅少數右翼傾向、親中華民國政府或者不發表當地華文作品的華文報刊未受查封。

本文所討論的文本之一『風雨耀華力』便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1964年在『華風週報』結束連載後，正欲出版單行本時，因『華風週報』刊登新中國消息，於是該報繼『中原』與『光華』及『體育週報』之後，與另一份『虎報』被泰國當局封閉。<sup>26)</sup>直至18年後的1982年，『風雨耀華力』才在香港正式出版單行本。

具體而言，泰華文學的文藝路線以寫實主義為主。貝納子認為冷戰時期泰華小說有些類似泰國文學中為人生而文藝的作品，試圖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殖民經濟進行批判。然而，就當時的泰華文學發展而言，所謂的批判性始終趨於保守，而這也是泰華文學相當注重「寫實」，並且在之後受到「作品平淡乏味」批評的主因。司馬攻認為，由於泰華作品大都受中國古典文學、通俗演義，以及1930、40年代中國作家作品的影響，對當代的、新的文學作品較少有機會接觸，因此逐漸造就保守的格局。若要深究其原因，除了由於作者的寫作觀與沈重因襲之外，對讀者的照顧是重要的原因。大部分的泰華讀者都屬年齡較大的「傳統讀者」，這使得泰華作者不得不繼承著「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來從事創作。現代主義的作品不單不能為讀者接受，而且往往引起了一些爭論。<sup>27)</sup>整體而言，泰華文學的發展明顯受到政局的牽制，並經歷曾心所說的「三起二落」發展。<sup>28)</sup>其中，在本文所探討的時

23) 曾心，『給泰華文學把脈』，廈門大學，2005，p. 6。

24) Bernards, Brian, 「雙向的混雜性：論冷戰時期泰華小說中的「泰化」」，『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2013年11月，pp. 127-128。

25) 吳繼岳，『吳繼岳文集』，曼谷自印，1989，無頁數。

26) 吳繼岳，『吳繼岳文集』，曼谷自印，1989，無頁數。

27) 司馬攻，『泰華文學漫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p. 15。

28) 曾心認為，泰華文學的第一起大約是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由於受到現代中國革命的影響，泰國出現了華文報刊，這是泰華文學的萌芽蓬勃期。第一落則是19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末，此時是泰國實行「泰認同」的時期，為了強化泰國認同，加上中國革命成功影響華人對政治的參與，使得泰國政

期，泰華文學就以長篇小說最具代表性。

冷戰時期的泰華文學主要依賴華文教育以及華文報刊作為培植養料與發表園地，泰國政府由於對華人的意識型態有所疑慮，因而限制華文教育與報刊的普及。然而，當地華人仍仰賴著親緣群體、社群組織的自助在困境中求發展。在這種文學發展的困境中，香港於冷戰時期的特殊政治環境就成為泰華文學出版與傳播的重要考量。

### 3. 泰華文學在香港的文學傳播

無論是本文所討論的接龍小說或者1990年代後盛行於泰華文壇的微型小說，皆是受到香港文學刺激而起。<sup>29)</sup>此外，香港的文藝刊物與出版社乃至其編制內的編輯，也在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生產與傳播上，扮演了關鍵性的守門人角色。香港能夠成為冷戰時期的華文傳播重鎮，當時的世界局勢與英國殖民政策是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司馬攻曾指出在1960年代左右，有一段時間中國的華文書刊不能進入泰國，台灣的華文書刊也鮮少在泰國出現，倒是香港出版的華文書籍、報刊，較有規模的、持續地輸入泰國。因此，1960、70年代，香港出版的華文文藝書刊，對泰華文學有很大的影響。泰華文學相當具代表性的「閃小說」，即是來自「掌篇小說」的概念，而「掌篇小說」一詞，也是由香港出版的刊物介紹到泰國來的。<sup>30)</sup>又或者本文所探討的『三聘姑娘』便是受到巴金小說『家』的影響而寫成，而當時這類中國小說也大多透過在香港翻印出版再透過發行商或者僑社分享、捐獻才傳播至泰華社群。也就是說，同時期的泰國小說受到西方翻譯小說影響，泰華小說則受到從香港傳播進入的華文文學影響。本文探討的三部長篇小說的作者：陳仃、史青、李虹、乃方、李栩、陳瓊、沈逸文、亦非、白翎、紅纓、亦舍是第一批在香港出版作品的泰華作家，也即是本文所稱「衝出湄南河」的先鋒。

在冷戰時期，泰國除了公布防治共黨條例外，為加強統治，也頒佈法令規定國內的集會結社必須透過法律程序的申請，經審查批准後才可成立。外僑的集會結社審查執行則更

府對華人有所打壓，導致泰華文學處於地下苦戰期。泰華文學的第二起發生在19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這是泰華文學的潮漲波峰期。在小說、散文、詩歌、文史、翻譯等方面，以長篇小說見長。第二落則是19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這時期泰國進入強烈反共時期並實施檢閱制度，泰華文學處於沈潛寂靜期。因為出版著作受到嚴查，只有少量著作在本地出版，而一部分小說、散文、譯作轉到香港、臺灣、新加坡出版。第三起發生於1980年代中期至2000年，這是所謂泰華文學的金秋豐收期。這期間，出版近三百本著作，超過泰華文學以前出版著作的總數。無論從數量看，還是從質量上看，都應該說是登上了一個歷史的新高度。尤其以散文的成就更為突出，令世界華文作家、評論家矚目。曾心，『給泰華文學把脈』，廈門大學，2005，pp. 4-5。

29) 徐學，「泰華寫作人筆下的泰華世界」，『風雨耀華力』，廈門市鷺江出版社，1987，p. 269。

30) 司馬攻編，『泰華微型小說集』，泰國華文作家協會，1996，p. 144。

為嚴格，而與文學最相關的出版社機構也屬集會結社的管轄範圍之內。泰華作家姚宗偉便指出，「出版條例」頒發的前期有些泰華作者因觸法而被判驅逐出境或入獄服刑。該條例的訂立，在1960、70年代執行最為嚴謹，也直接使得這個時期的華文文學結社少，境內出版減少。若有未註冊的華文文學團體出版書籍，便會造成違法出版品。<sup>31)</sup>也就是曾心所說的：「因為出版著作受到嚴查，只有少量著作在本地出版」。<sup>32)</sup>於是，泰華作家紛紛向外尋求出版管道。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與臺灣也分別有著出版管制，因此，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特殊身分，反而成為當時華文出版的相對自由陣地。

馬華學者潘碧華曾以新馬文學為例，指出1950至60年代香港並未禁絕共產中國的文藝出版，甚至有許多五四文學名家作品得以先在香港出版後再輸入到東南亞。同時，香港作家作品單行本的大量傳播，在當時扮演著中華文化在海外傳承的角色。<sup>33)</sup>提出「泰華作品出國」的泰華作家落葉谷，也有好幾部作品在香港、台灣出版。他在香港藝美圖書公司出版的小說散文集『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序」中提到：「由於一種文字上的很偶然的因緣，竟謬蒙暢銷東南亞的讀物『青年文藝』編者袁逸明先生賜予一個出版的機會，使這些作品能夠衝破象頭形地圖的疆界。」<sup>34)</sup>顯然，泰華文學之所以能在香港出版，原因之一是受到關注東南亞華文作品的編輯邀請。然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何以成為東南亞華文的出版重鎮？事實上，除了冷戰時局外，也與英國殖民政策有莫大的關聯。

戰後，在充滿動亂、極端動盪的五〇年代，臺灣與香港兩地，都是英美國家反共陣線的一員。當時的臺灣因為國共內戰而實施戒嚴令，香港卻因中英鴉片戰爭協定成為華人得已自由出入的地方。在冷戰結構下，香港的身份因而顯得特殊。一方面，它是被割讓、被長期租借給外國人的地方。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成為不同政治力量互相連結、角力的空間。帝國主義將香港及沿海租界視作侵佔中國利益的跳板，而革命力量與受政治迫害者則以香港為串連或避難的空間。香港既接受過逃避國民黨壓迫的共產主義者，也容納過大量反共產政權的人士。在如此動亂時代中的文學產出，大多是受政治力催逼而生。這也是張誦聖於〈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中所提及的一種「始料未及」(unintended consequences)。<sup>35)</sup>始料未及的成果反映出華文文學的傳播網絡，也開拓了冷戰時代的東南亞文學場域議題。

汪浩在研究冷戰時期英國對台灣政策時發現，英國在冷戰時期對臺港的政治決策時常

31) 姚宗偉，「泰華文藝的淳樸和理性」，『香港文學』，第161期，1998.05.01。

32) 曾心，『給泰華文學把脈』，廈門大學，2005，pp. 4-5。

33) 潘碧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傳播的影響(1949-1975)」，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pp. 747-762。

34) 落葉谷，「序」，『一江春水向東流』，香港藝美圖書，1958，p. 1。

35) 張誦聖，「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2011年5月，pp. 17-39。



出現模擬兩可、舉棋不定的情況，然而英國本身卻總自認為是扮演著國際局勢的節制與協調角色。汪浩指出，英國絕大多數的部會首長和官員們是如此堅定相信，由於美國人還不熟悉身為世界大國的責任，而且在運用力量時往往又不負責任，唯有英國溫和的壓力才使得美國不致踰越與衝動。更重要的是，英國決策者主張英國之所以有能力在戰後舞臺上能獨立行動，與它介入、控制美國在世界舞臺的能力有關。因此英國應該仔細注意美國的遠東政策，並且如果美國偏離在本區域謹慎、節制的道路，就要拼命地抗議。而這正是英國在1950年代追求鮮明的對華政策的主要思維。因此，「特殊關係」可被當做外交策略——英國在全球與美、蘇強權來往時一個鮮明的作法。<sup>36)</sup>

因此，英國作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二次大戰戰勝國，它自覺應扮演著不同意識型態之間的潤滑劑。然而，當時英國國力正在衰退，加上誤判國際局勢的演變，英國在香港並未提出完善的殖民政策，使香港順利「同化」。也就是說，英國一方面試圖維護最要緊的自由港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開放性質貿易會縱容政治活動的發展甚至危害治理的穩定性。王宏志使用了「球證」來指稱當時的港英政府角色：「在1950至60年代意識形態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是明顯缺席的，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近乎『球證』。遇有那一邊越位過火，就進場緩衝」。<sup>37)</sup>這大概就是很簡潔地描述了在政治層面而言，香港作為中、台以外的特殊華人文化空間的境況。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的邊緣化位置提供了方便文化宣傳的對抗條件。不同政治陣營的知識份子（尤其南來文人）紛紛發展新聞報業，在香港作為冷戰中雙方的宣傳基地。他們透過文化宣傳，對臺灣、中國、東南亞，甚至歐美的華文讀者進行各自的政治宣傳。他們以香港為基地，在「家國之外」傳播家國心音，直接影響了冷戰時期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傳播。而泰華文學也剛好在國內出現排華與出版檢閱制度的壓力下，在香港找到另一個出版管道，從而得以延續湄南河的文學，並進而將湄南河文學帶回泰國。

#### 4. 泰華長篇小說的香港想像

本文以冷戰時期的泰華三部極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為觀察對象，討論陳仵『三聘姑娘』、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史青『波折』如何將香港想像成他方。本文要指出的是，香港不僅提供了泰華文學發展、出版以及傳播管道，更在作品中成為被欲望的對象、窺視西方文化的空間。這不僅僅出現在本文所討論的三部小說當中，在諸多泰華文學作品中，香港都具備上述之功能意義。為了方便本文討論，以下先就三部長篇小說的作者、故事梗概進

36) 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台北有鹿文化，2014，pp. 49-50。

37) 王宏志，『本土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7，p. 62。

行介紹，再進而詮釋小說中的香港想像。

### 1) 陳行<sup>38)</sup>『三聘姑娘』

1953年『三聘姑娘』首先連載於陳行所主編的『半島文藝』半月刊，1954年隨即在香港大地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三聘姑娘』講述曼谷著名唐人街耀華力路 (Yaowarat Road) 附近的三聘街 (Sampeng Lane) 的「興記」商家女兒們的婚姻問題與處事之道。

興記號有兒女四人，由於第一任妻子早逝，興記老闆續弦，因此長女與三弟妹為同父異母的手足。長女寶珠畢業後便在家中協助生意帳目，多年前因與心賢<sup>39)</sup>的戀情不被父親接受而鎮日鬱鬱寡歡；次女秀珠懂泰文、英文，具社交手腕，與另一商號李合隆的三子大榮訂有姻親；三子紹基懂泰文、英文，貪圖享樂；四女珮珠性格開朗善良，尚在中學就讀中。

小說以次女秀珠收到媒人送來價值五萬銖的訂婚戒指為開端，對比長女寶珠因長期單身的落寞與「不堪」。四女珮珠一直想與大姊親近，卻總不得其門而入。小說圍繞著長女與次女各自的婚姻問題為主軸，四女珮珠則扮演推動情節的串場人物。小說透過描述次女秀珠的婚事批判了買辦婚姻，以長女秀珠因以過世俗社會認定的適婚年齡而遭受各種冷眼冷語來指出現實中的性別歧視、父權家長制以及教育問題。也就是說，陳行試圖透過小說，對1950年代的泰華社會提出問題並引發讀者反省的可能。當三聘街成為泰華社群的象徵時，三聘姑娘便是泰華青年的擇偶標準，而三位女主角的性格設定都代表了某種範型的女性。陳行以小說反映社會問題、質疑主流價值，最後推翻封建觀念，迎接新潮流。從小說中，可以發現泰華社群所遵循的中國傳統禮教文化，同時也能感受到在西化浪潮下泰華社會所受到的衝擊與轉變。

### 2) 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

38) 陳行，原名林維新，又名林青。常用筆名為郭城和陳行。中國廣東省揭陽縣梅云鄉人。1943年參加聯文社，接觸進步書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參加泰國華僑青年總會，任該會康樂部主任。曾任『青年公報』總編輯、『全民報』副刊編輯、『真話報』編輯等。陳行主編『全民報』副刊「全民公園」時期，為許多寫作者提供發表管道，同時自己也創作了大量作品，有散文、雜文、小說、文藝評論等。1953年6月創辦『半島文藝』半月刊，頗受泰華文壇矚目。1954年，『半島文藝』在出版32期後被迫停刊。陳行隔年攜眷回中國。在中國期間，仍從事文化工作，擔任過僑務部門、中國新聞社記者工作。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曼谷泰中學會，2000年，p. 73-74。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p. 239。

39) 心賢」借自泰語，指的是「文書、會計」一類的工作。參徐復嶺，「泰國華語同普通話的詞匯差異」，『語文建設通訊』，第63期，2000，<http://www.huayuqiao.org/Doc8800/8815.htm> [2020. 12. 20.]

『風雨耀華力』由九位作者：李虹<sup>40</sup>、乃方<sup>41</sup>、李栩<sup>42</sup>、陳瓊<sup>43</sup>、沈逸文<sup>44</sup>、亦非<sup>45</sup>、白翎<sup>46</sup>、紅纓<sup>47</sup>、亦舍<sup>48</sup> 集體創作而成，於1963至64年間連載於『華風週報』。由於該報於1964年遭禁，『風雨耀華力』原先預計要循首部接龍小說『破畢舍歪傳』的前例連載後出版單行本，也因時局變故，遲至1983年始由作者之一的沈逸文將當年的連載剪報交由香港地平線出版社集結出版。<sup>49</sup>

『風雨耀華力』的寫作構想由方思若在每週日的文友聚會中發起。由於該聚會中有六名作者曾參與『破畢舍歪傳』的寫作，因此乃方提議再來一次集體創作，並以耀華力路為故事背景。陳瓊則從新加坡話劇『風雨牛車水』取得靈感，建議小說名稱為『風雨耀華力』，獲得全體同意後，再安排寫作順序，並共同訂立小說主題為「以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的立場，來寫出反映僑社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之後並固定聚會，共同討論人物安排與故事推展。小說隨後便在方思若主編的『華風週報』上連載，並獲得讀者歡迎，甚至有讀者寫信至報社詢問小說主角是否真有其人。<sup>50</sup>

『風雨耀華力』共41章，每章結束前皆有接龍請求語讓讀者知道下一章的作者與可能發展。小說以兩位年輕男性——李俊、鴨脯為主角。兩位皆來自泰南合艾埠的「山巴」<sup>51</sup>，

40) 李虹 (1934-1993)，本名許靜華，筆名李虹、年臘梅等。生於曼谷，原籍中國廣東省澄海縣。1950年代開始寫作，1955年擔任『世界日報』資料室職員。1979年任『新中原報』資料室主任兼社會版編輯。1982年任『中華日報』副刊編輯。著有短篇小說集『花街』、『湄南河畔的故事』、中篇小說集『在鷹爪花架下』、散文集『長春藤』、『泰華寫作人剪影』等。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 105。

41) 乃方 (1931-1999)，本名方思若，筆名游戈、筆匠等。曾任小販、建築工人、『曼谷新聞』副刊主編、『華風週報』創辦人、『新中原報』董事長等。參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pp. 2-4。

42) 李栩 (1923-1993)，本名李慶良，筆名亞子、李半唐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潮州市。1950年代開始創作，1980年代出版『火礮頭家』、『光華堂』、『不斷的根』。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 27。

43) 陳瓊 (1905-1992)，本名吳繼岳，筆名珊珊、沉戈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梅縣。曾任小學教員、新加坡『星洲日報』外勤記者兼編輯、『中原報』記者兼副刊編輯、『東南日報』與『新中原報』編輯。曾因「違反愛國罪」遭沙立政府逮捕入獄五年多。著有『僑領正傳』、『海外五十年』等。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p. 46-47。

44) 沈逸文 (1936-)，本名沈森豪，筆名沈牧、蔡裕利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潮安縣。1950年代開始創作，著有『羔羊淚』、『醋海遺恨』等，譯有『泰國短篇小說集』、『崇高的榮譽』等。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p. 29-30。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p. 72。

45) 亦非 (?-1984)，本名陳英實。原籍中國廣東省潮安縣。曾任商行會計，主要創作散文、短篇小說。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 21。

46) 白翎 (1931-2016)，本名李友忠，筆名百靈、柳宗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潮安縣。曾任『新中原報』副刊主編、出口行翻譯、潮州會館圖書館館長等，著有『這裡的夜靜悄悄』。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 13。

47) 紅纓 (1932-)，本名鄭玉洲，筆名鄭州、夜郎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潮陽縣。曾任『中華日報』、『京華日報』政治記者、『華風週報』翻譯員兼副刊編輯、『新中原報』採訪主任等。著有『幸福底罪痕』。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 133。

48) 亦舍 (1927-)，本名倪隆盛，筆名倪長遊、余多幻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揭陽縣。1946年來泰。曾任小販、家庭小組華文教師、『新中原報』副刊主編，著有『溫暖在人間』、『鬼域正傳』、『狗精傳』等。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p. 90-91。

49) 巴爾，「揚帆泰華文學海洋三十年的沈逸文」，『香港文學』，第7期，1985. 07. 05。

50) 吳繼岳，『吳繼岳文集』，曼谷自印，1989，無頁數。

他們原在膠園工作，後因膠園經濟陷困，兩人分別抵達曼谷，並一同在大都市中困苦生存。李俊家中經營膠園，屬中下等膠農，曾至檳城完成初中課程，之後在家協助割膠並兼家庭教師。鴨脯自幼喪母，父親為鞋匠，十多歲便四處打工。因在李俊父親經營的膠園工作而與李俊相識進而成為好友。兩人前後抵達曼谷後，頻繁出現經濟困境，然而作者群顯然特意營造出兩人的性格對比，受過基礎教育的李俊較易悲觀、鬱鬱寡歡，甚至受到打擊而重病不起。反而鴨脯因自小便四處打工維生，人生閱歷較豐富，性格樂觀且八面玲瓏。

『風雨耀華力』以耀華力路為主要故事場景，講述一段發生於1964、65年間的華裔青年奮鬥故事。故事呈現耀華力路作為當時曼谷商業中心的繁華盛況，鐘錶行、銀樓、百貨、飯店、咖啡館、麻將館、舞廳、電影院等林立，而初來乍到的鄉村青年在這都市叢林間屢屢遇險，所幸過程也頻獲耀華力路的華人社群互助合作，最後李俊順利進入報界工作，並與有情人成眷屬，鴨脯也與父親團聚經營穩定生意。其他幾位故事同儕也都各奔前程，展開人生新頁面。『風雨耀華力』除映現耀華力路的舊時榮景外，人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也體現泰華文學提倡的社群互助與向心號召，而最終的幸福結局則符合一般讀者對於情有所歸的期待與想像，由此也再製出泰華文學對華人讀者的情感召喚。

### 3) 史青<sup>52)</sup>『波折』

史青於1973年在香港上海出版社出版『波折』，彼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與泰國建交，政局基本上延續著自1950年代以來的局勢。『波折』的故事發生時間設定在國共戰爭時期，篇名『波折』除隱喻主角的坎坷運途外，也指涉在紛亂的政治局勢下，泰華文學的發展受挫以及華文人才培育的困難。『波折』講述一名知識分子李文自中國廣東汕頭搭乘輪船抵達泰國後，如何試圖在泰國實踐自己對華文教育的理念，然而波折四起的故事。

小說主角李文在汕頭原擔任潮州市一間小學的校長，直至1946年冬季，他因一篇發表於『潮州商報』副刊的小說，引起地方權貴指責。在地方勢力向他進行軟硬兼施的威逼之時，李文輾轉得知戰後南洋各地正在興建華校，亟需師資。李文便毅然決然離開原鄉，來到曼谷辦理華文教育。

李文在汕頭有一論及婚嫁的情人惠華，兩人商妥李文先出發曼谷，之後待生活穩定便

51) 山巴(芭)，泰國的內地、鄉下之意。是泰華文學中頻繁使用的詞語。

52) 史青(1924-1996)，又名魏登，本名魏立大，筆名史青、史丁蜜等。原籍中國廣東省潮安縣峙溪鄉。曾任城鎮第四中心小學校長。1940年代，以筆名史丁蜜發表小說「農村三疊曲」於『潮安商報』，得罪當地權貴，被迫離鄉。1947年南渡來泰。1950年代執教於黃魂學校和泰華中學。華校被封後，轉入報界。曾任『中華日報』「文學」、「朝花」版主編、『東南日報』社務主任兼副刊主編、『新中原報』副刊主編、『中原日報』副刊主編。著有小說『波折』、『灰色的樓房』、『沉沉的鐘聲』，雜文集『潮州故事和歌謠』、遊記、詩集、政治評論等。參洪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pp. 154-155。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pp. 19-23。

相會南洋。李文下了輪船隨車進入唐人大街耀華力路，不遠處是滿是阿舍<sup>53)</sup>的三聘街。不久，李文在親友的協助下，在華僑中學擔任中文教師。然而華僑中學的行政系統有著嚴重弊病，李文感到適應不良。李文無意中結識了一位有心助他另闢新華校的富家女子，卻又因無法認可富家女子的怪謬行徑而斷絕往來。後來，李文與中學時期的女同學素嫻相遇，素嫻苦戀李文，然而李文癡情等候遲未赴約的惠華，直至兩人重逢後，才深知彼此早已因生活環境不同，走向分歧的人生道路。後來李文與素嫻結成連理，隨後卻又遭遇李文被迫自華校辭職，擔任會計、捆工的困境。李文在曼谷十年，經歷了愛妻死亡、理想幻滅，甚至遭到不明人士的暗殺。最後由於他從事華文學習小組的教育工作，遭逮捕入獄。出獄後，李文被移送出境，再次返回汕頭。

從李文的經歷看來，『波折』顯然是作者史青的半自傳小說。史青也於「後記」中指出此書寫於「風聲鶴唳的苦悶日子」，並且要獻給「泰華教育工作者」、「在學習道路上的朋友」以及「戀愛中的青年」。<sup>54)</sup>史青與陳衍一樣，都試圖透過寫實主義小說提出他們所關懷的社會問題。『波折』除具有作者本身的經歷投射外，它從男性知識分子的角色出發，從「新唐」移民角度看待泰華社會的變化。『三聘姑娘』當中的興記號成員儼然是「老泰華」（或「老唐」），他們在乎的是生意興隆與否以及婚家生活。『波折』當中由李文所代表的新唐移民則頗有具文化傳承使命感的時代英雄意味，也是諸多泰華作家心心念念著的重大課題。

『三聘姑娘』、『風雨耀華力』與『波折』皆描述了冷戰初始20年的泰華社會景況，然而，由於主角身分地位的不同，三部小說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時代風景。

三部小說完成的時間分別是1953年（『三聘姑娘』）、1964年（『風雨耀華力』）以及1973年（『波折』），而故事的發生時間則是1953年前後（『三聘姑娘』）、1964年前後（『風雨耀華力』）以及1950年前後（『波折』）。

『三聘姑娘』以商家女兒為主角，三位女主角都受過教育，經濟上也有原生家庭「興記號」的支持而無虞。『風雨耀華力』以兩位鄉村青年為主角，李俊屬於鬱鬱不得志的知識分子，而鴨脯則是受僱於人的底層勞工，兩人在曼谷時常為經濟問題而煩惱。『波折』的李文則是不停受到政治力脅迫的知識份子，經濟雖不寬裕，但並非主要困擾。如何在異地落地生根、推動華文教育才是李文最在意的問題。儘管三部小說的主角身份有所差異，香港卻都不約而同出現在三部小說當中，並且扮演著西方想像、物質欲望、流行文化代表、遁逃空間或者解決問題的方式。

首先，在『三聘姑娘』故事當中的一場舞會上，次女秀珠的未婚夫大榮被眾女士圍繞，旁人你一言我一語和大榮親熱談話著：

53) 潮州話，指富貴人家。

54) 史青，『波折』，香港上海書局，1973，p. 282。

一群摩登的娘兒們發現了大榮，一窩蜂似的都湧到樹下來，把大榮團團圍住了。有的叫：「坤榮，好久不見了，我以為你去做和尚了呢？」有的叫：「蜜司脫李，我以為你不在曼谷，坐飛機到香港去了呢？」有的叫：「李先生，這些時為什麼不去我家坐了？我想念得你很苦呀！」泰話、英語、潮語、國語混成一。大榮好像成了一位重要的國際人士被圍在當中，對這太多的問話，一時感覺難以應付，只是把手亂揮叫她們別鬧。<sup>55)</sup>

這段敘述描繪了時髦男女的聚會話題，「到香港去」是其中之一。作者雖未加以說明大榮是否有到香港，到香港的目的為何。然而讀者還是能從這場上流社會的繁華場景中感覺到香港是個流行話題，在青年社交場合中相當受歡迎，且時常被呈現為一種消費文化的欲望之地。

如果說香港的魅力無法清楚從這群嗜好泡舞會的青年男女口中得知，那麼『三聘姑娘』老泰華興記頭以及『波折』中的大老闆座山羅的想法則是實際表述了何謂「必去香港」的幾個理由。

對於興記頭與座山羅這樣的生意人來說，他們嚮往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也崇尚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物質文明。因此，他們將子女送入洋學校讀英文。認識英文便是把業務範圍拓展到洋人圈的第一步：

為什麼封建、守舊的興記頭會把他的二女兒送進洋學校呢，如果說這是西方的物質文明薰陶了他，西方的民主潮流沖塌了他封建的圍牆，不如說這是一種華僑商業社會的買辦性質的形勢造成的。原因是興記頭已經由經營土布為主的商業，發展轉變成經營洋布為主的商業了，他需要一兩個懂得洋文可以和洋人打交道的心腹助手。<sup>56)</sup>

在三聘街經商的興記頭老闆所盤算的無非是經濟利益。他將兒女視為一種資源，由於察覺泰國正不停輸入西方潮流，因此讓兒女在外語學校接受教育，希望能逐漸培養成家中經商時不可或缺的國際線經營人才。那麼為何是將兒女送至香港的外語學校呢？史青在『波折』中有了說明：

他向來看著別人把兒女送到澳洲、倫敦或美國去「讀大書」，回來的時候親友們到機場迎接，甚且有些報紙還替他們刊出照片來，多麼威風十足！他每次看後總是心頭癢癢的。他又認定將來曼谷商場，一定是要那些識得紅毛字的才可賺大錢，打大世界；所以，他決定把年紀較小的二個兒子，送入本京的一家紅毛學校讀書：以實現他的第一步計畫。但他仍覺得，本地貨總歸還是本地貨，哪裡及得上舶來品——土製糞缸哪裡可和紅毛的抽水馬

55) 陳竹，『三聘姑娘』，香港大地出版社，1954，pp. 27-28。

56) 陳竹，『三聘姑娘』，香港大地出版社，1954，p. 40。

桶相比？可是如果給他們去得太遠，自己又不大放心。香港倒比較近些，但仍可算「外國」，那裏有熟人，又可以拖他們代為管顧。而為了要出國讀書的事，以前兒子們亦曾經與他爭吵過，是他自己因事務繁雜，沒有加以詳細考慮，所以尚未下決定。現在，不如乘此機會把女兒亦一同送到香港去讀書，豈非一舉兩得？<sup>57)</sup>

『風雨耀華力』小說中有一場「迫婚喜劇」，在那之中，母親角色的對話也呈現了和興記頭、座山羅相似的想法。只是性別角色有所調換，從父親的命令改成母親勸說女兒嫁給曾去香港讀大學的有錢男性：

阿杏妹，聽阿媽嘴哪！阿媽是欲你好，才會給你主意這頭親事，那正利和三舍，人又英俊，家資又富足，才學又好，他曾去香港讀過大學的。你一嫁過去，就是堂堂三舍娘，這有什麼不好？<sup>58)</sup>

在這裡，這位母親使用了母語潮州話「聽阿媽嘴」，表示「聽媽媽的話」。而她試圖說服女兒嫁給具有香港的大學學歷的富貴人家三公子。擁有香港學歷在這裡成為泰華社群考慮婚姻的重要文化資本。然而女兒阿杏妹並不願出嫁，在她看來，香港學歷並不吸引她，吸引她的是知識份子李俊。當阿杏妹不願出嫁時，媒婆便為阿杏的母親獻計：

阿奶，這個妳不用耽憂，我們不要把實事告訴她，只要勸說她到香港或任何地方去旅行，說是開開眼界，然後暗約三舍，就在那裡旅行結婚好了。<sup>59)</sup>

媒婆的策略是透過哄騙阿杏妹到香港旅行，「開開眼界」。也就是說，對於泰華社群而言，香港是一個具有新奇美好事物、能增長見識的地方。媒婆對於香港的想法，與『三聘姑娘』的青年男女雷同，是能在那裡體會前所未有的經驗之處。此外，媒婆所提到的旅行結婚，恰好是當時東南亞青年男女盛行的結婚方式。當時由於飛機已從戰爭時期的軍事與運輸功能轉換成大眾交通功能，跨國觀光成為可行的旅遊方式。加上新婚的青年男女有些並不富裕，或者不願花費過多金錢在婚慶喜宴上，加上進步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等地的青年也相當盛行此種結婚方式，而逐漸影響東南亞青年男女。因此，旅行結婚並在報紙上刊登新婚旅行公告是當時東南亞青年男女相當風行的婚姻體驗。從中也能看出，泰華社群在婚配制度上雖仍有著保守社會中將兒女視為資本的觀念，然而對於傳統禮儀的遵循則顯得開放、寬容許多。

57) 史青，『波折』，香港上海書局，1973，p. 94。

58)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p. 181-182。

59)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 202。

香港在『三聘姑娘』、『波折』與『風雨耀華力』中，顯然扮演著能解決女兒的戀愛與婚姻問題、家中經商問題，除此之外，還具備了藏匿犯罪者的重要功能。在『三聘姑娘』中，有一位興記總管阿茂，由於挪用公款私下投資冷戰時期的黑市商品而東窗事發。無法承受後果的他，最後選擇離開曼谷，逃到香港：

已經七時了，去找阿茂的二奶還沒有回來，一陣急躁立刻又掀上心頭，一陣怒火不禁又燃燒了起來。「老娼！死到什麼地方去了？到現在還不回來！」他跺腳罵了一聲，霍地從椅子裡站起來。但是當他回過身來時，卻發現二奶已經回來了，她鐵青著臉站在帳房的圍欄邊。「怎麼樣？阿茂呢？不敢來？」「他！……」「他怎麼了？」興記頭立刻靈敏地預感到一種不幸。

「阿姣說，他昨晚到香港去了！」<sup>60)</sup>

『三聘姑娘』中阿茂的潛逃反映出冷戰時期香港特殊的「暫時空間」身分，而阿茂在香港進行黑市商品的貿易也並非個案。香港史學家高馬可 (John M. Carroll) 在『香港簡史』便指出，在韓戰時期，由於中國禁運，香港扮演著金融匯兌與日常用品的支援角色。許多稀有貨品如天然氣、煤油、盤尼西林等從香港走私進中國，僑民匯款也能透過香港轉匯到中國。而這些都是由於港英政府對香港採取務實的對華政策，不特別干涉香港的政治地位問題。<sup>61)</sup>

此外，作為冷戰時期文化宣傳最發達、出版相對自由的地方，香港的流行文化、文學自然也影響到泰華文學的寫作。『波折』中那位富家女娜娜為了親近知識份子李文，在一次約會談天中得知李文喜好文學，便自己提及：

「我亦是喜歡文學的。」娜娜卻像遇到知音似的興奮。……「香港那幾位出名作家所寫的小說我都看過。他們寫得真迷人，真夠水準！」她說話時眉毛不時配合動作向上揚起。<sup>62)</sup>

娜娜究竟是真心喜愛文學或者僅是為博取李文的好感，小說並未多加說明。至於娜娜所提到的「香港那幾位出名作家所寫的小說我都看過」指的又是哪些作家？哪些作品？讀者也不得而知。儘管如此，娜娜卻也透露出一條線索：在泰華社群中，來自香港的文學、文化或者電影作品頗受到當地讀者的歡迎。類似的情節，在『風雨耀華力』中也有所表現。小說初開始便說：「座落耀華力路頭的新高亭戲院，這晚上正上映『山歌戀』<sup>63)</sup>，一部闊銀幕

60) 陳竹，『三聘姑娘』，香港大地出版社，1954，p. 120。

61) Carroll, John M. 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p. 168。

62) 史青，『波折』，香港上海書局，1973，p. 132。

63) 羅臻編導作品。由葉楓、關山、蔣光超、歐陽莎菲、李婷主演。1964年07月15日上映於香港。本片



七彩國語歌唱片」<sup>64)</sup>，而方思若在描寫小說主角李俊外貌時，則以『山歌戀』男主角作為想像的客體：「他有一對大而聰明的眼睛，奕奕有神，俊直的鼻樑配合著闊厚的嘴巴，一頭半長不短的『壓毛』，似亂非亂地，有幾根垂壓在眉角上，樣子是挺瀟灑而帶幾分書卷氣，電影裡有些傻氣的紅小生關山，可並不比他英俊得多少呢！」<sup>65)</sup>此外，泰華人愛看的潮劇在沒落後，戲院老闆也逐漸「向香港接洽了潮音的粵語片來代替潮劇，使粵語片的羅劍郎，任劍輝，芳艷芬等，名噪一時。」<sup>66)</sup>而女主角杏妹在向李俊告白時，因兩人有師生關係，因此杏妹也使用了在香港盜版發行的小說『師生戀』作為試探李俊心意的傳遞物。<sup>67)</sup>

後殖民主義學者薩依德 (Edward Said) 在『東方主義』中提到，亞洲通過歐洲的想像而得到表述，歐洲文化正是通過東方主義這一學科的政治的、社會的、軍事的、意識型態的、科學的，以及想像的方式來處理，甚至創造東方。<sup>68)</sup>在本文中，泰華小說便是通過對香港的各種想像得到表述。它們有香港幻想，並且幻想香港，與此同時，它們也創造了香港。當香港成為西方窺探神祕中國的窗口時，香港也成為東南亞窺探西方的窗口。從這裡也驗證了張錦忠所提出的「小文學，複系統」意義。正是這種當代華文文學系統的國際交流現象與旅行跨國性，使得中國、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的華文文學，從來都不是孤立隔絕的鎖國系統。<sup>69)</sup>

## 5. 結語：小文學與複系統的突圍

本文從三部泰華長篇小說：陳竹『三聘姑娘』、接龍小說『風雨耀華力』與史青『波折』中去看泰華小說中的香港因素。本文所指的香港因素包含香港如何成為泰華小說的出版地，以及香港在泰華小說中又具體扮演了什麼樣的故事功能。也就是說，本文嘗試站在泰國華文文學的生產與傳播角度去理解香港在冷戰時期對於泰國華文文學生產、傳播的重要性，以及具體涉及的特殊冷戰歷史與文化語境。泰華文學的發展與許多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發展一樣，深受文化母國與當地政局、文化的影響。這也是張錦忠提出「小文學，複系統」時所強調的跨國性與畛域性。漂泊離散是危機，也是小文學的轉機。當泰國應執行雷厲風行的

是葉楓加盟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首部電影綜藝體弧形闊銀幕影片。<https://www.itsfun.com.tw/%E5%B1%B1%E6%AD%8C%E6%88%80/wiki-755133> [2021. 11. 10.]

64)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 3。

65)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 4。

66)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 124。

67) 李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pp. 162-163。

68) Said, Edward 著，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1999，pp. 4-5。

69) 張錦忠，「小文學，複系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意義」，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萬卷樓，2003，p. 321。

反共政策而對華文教育、華文文學以及華人、華裔的活動有所排斥與打壓時，泰華作家因應時局變化而採取的策略是在當地報刊發表後，移地出版，讓以湄南河為主體的泰華文學先在泰國現身，而後再度於香港亮相，並再以相較報刊較易保存的單行本形式，從香港返回泰國進行流通。儘管目前的泰華文學已應數度中斷的華文出版、華文教育，以及成功的同化政策而缺乏新一代創作者加入，然而在冷戰時期，香港作為中介地，為這段文學史添加了一些生機。在本文中，香從這裡也驗證了張錦忠所提出的「小文學，複系統」意義。正是這種當代華文文學系統的國際交流現象與旅行跨國性，使得中國、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的華文文學，從來都不是孤立隔絕的鎖國系統。

本文介紹了冷戰時期泰華文學的發展以及冷戰時期香港「得天獨厚」的出版條件，並以泰華小說的角度觀看香港。從中發現，香港作為高度商業城市，其特殊的政治空間與物質條件，使其成為冷戰時期中文與華文的文學與文化生產傳播中心。當泰華文學作為一種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面貌之一進入香港文學市場，除了提出另一種混合泰國語境的中國性之外，寫作語言混用中文、潮州語以及泰文的方式，也展現了多言語境，形成駁雜華文。即便泰華文學在冷戰時期之所以要「出走他方」，一方面是受迫於泰國國內環境限制，彷彿游牧四方的吉普賽人，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是由於泰華作家群相當有自覺意識地提出出走方案，讓泰華文學在特殊的冷戰文化情境中，成功自困境中突圍。

## 【参考文献】

〈單行本〉

- 本傑明·扎瓦茨基 (Benjamin Zawacki) 著，楊芬雯譯，『泰國：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戰場，在夾縫中求存的東南亞王國』，馬可孛羅，2019。
- 陳大為，『亞洲閱讀：都市文學與文化（1950-2004）』，臺北萬卷樓，2004。
- 陳 行，『三聘姑娘』，香港大地出版社，1954。
-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
- 曾 心，『給泰華文學把脈』，廈門大學，2005。
- 高馬可 (John M. Carroll) 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
- 洪 林，『泰華文化人物辭典』，曼谷泰中學會，2000。
-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元尊文化，1998。
- 劍 曹，『踏影集』，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 李 虹、陳瓊等著，『風雨耀華力』，香港地平線，1983。
- 落葉谷，『一江春水向東流』，香港藝美圖書，1958。
- 羅茲·墨菲 (Rhoads Murphey) 著，林震譯，『東亞史』，北京世界圖書，2012。

- 年臘梅,『泰華寫作人剪影』,曼谷八音出版社,1990。
- 史青,『波折』,香港上海書局,1973。
- 司馬攻,『泰華文學漫談』,曼谷八音出版社,1994。
- 司馬攻編,『泰華微型小說集』,泰國華文作家協會,1996。
- 吳繼岳,『吳繼岳文集』,曼谷自印,1989。
- 汪浩,『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台北有鹿文化,2014。
-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 David Smyth and Manas Chitakasem, *The Sergeant's Garland and Other Stories*,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eo E. Williams, *SouthEastAsia: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论文>

- 「泰國防止共黨活動條例」,『司法專刊』,第55期,1955.10.15。
- 巴爾,「泰華文學小史」,『香港文學』,第70-72期,1990年10月-12月。
- \_\_\_\_\_,「揚帆泰華文學海洋三十年的沈逸文」,『香港文學』,第7期,1985.07.05。
- 貝納子(Brian Bernard),「雙向的混雜性:論冷戰時期泰華小說中的「泰化」」,『中山人文學報』第35期,2013.11。
- 賴伯疆,「五四前後泰國華文教育、報刊、文化與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五四在東南亞』,八方文化創作室,2019。
- \_\_\_\_\_,「群體意識和個人智慧的巧妙結合——淺談泰華文學中的「接龍小說」」,『廣東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 潘碧華,「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傳播的影響(1949-1975)」,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0。
- 徐復嶺,「泰國華語同普通話的詞匯差異」,『語文建設通訊』,第63期,2000。
- 徐學,「泰華寫作人筆下的泰華世界」,『風雨耀華力』,廈門市鷺江出版社,1987。
- 姚宗偉,「泰華文藝的淳樸和理性」,『香港文學』,第161期,1998.05.01。
- 張誦聖,「臺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2011.05。
- 張錦忠,「小文學,複系統:東南亞華文文學的意義」,吳耀宗編,『當代文學與人文生態』,萬卷樓,2003。

<其他资料>

泰華文學網站: [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문화적 냉전, 시노폰 문학, 태국-시노폰 문학, 태국-시노폰 소설, 문학 전파				
	영문	Cultural cold war, Sinophone literature, Thai-sino literature, Thai-sino novels, Literary communication				
<p><b>A Study of the Sino-Thai Literature and Hong Kong Factor during the Cold War : Novels as Examples</b></p> <p style="text-align: right;">Weng Chih-Chi</p> <p>In 1950-60s, anti-communism prevailed in Thailan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anti-communism, Thai government had anti-Chinese measures and censorship system. During that time, man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ublishers were forced to close , and some Sino-Thai writers were sent to prison. For continuing the development of Sino-Thai literature, writers had published works abroad, and Hong Kong was the main publishing place due to loos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publishing conditions. Becaus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structure, Hong Kong not only became a Chinese publishing base, but also a place of imagination for the West and consumer culture. This study tries to focus on three important and representative Sino-Thai novels, which were Chen Din's Ladies of Sampeng Lane, Shih Qing's Bo Zhe, and solitaire novel Feng Yu Yaowarat which were written by nine authors, discuss what kind of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does Hong Kong provide to Sino-Thai literature, and how does Sino-Thai novels respond to or imagine Hong Kong in their stories? This study regards Sino-Thai literature as a kind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wen-wen-xu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xt of 'pure Chinese' and full of small and different Thai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at the story level, these three novels reflect the rich faces of Sino-Thai communities, and at the publishing level, they represent the successful attempts of Sino-Thai literature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during the Cold War.</p>						
저 자	윙즈치 / 翁智琦 / Weng Chih-Chi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1.11.20.	심 사 일	2021.11.29.	게재확정일	2021.12.18.